

文史臺灣學報

Taiwa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2 第二期

〔抽印本〕

殖民地新故鄉

——以真杉靜枝〈南方之墓〉、〈南方的語言〉

的臺灣意象為中心

邱雅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出版

Graduate School of Taiwanese Cul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cember 2010

殖民地新故鄉

——以真杉靜枝〈南方之墓〉、〈南方的語言〉 的臺灣意象爲中心

邱雅芳ⁱ

摘要

真杉靜枝是日治時期在臺灣成長的女性作家，對於故鄉的辯證關係，日人女性的「家」之所在，是她念茲在茲的書寫企圖。〈南方之墓〉（1934）可說是她的早期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以日人女性的觀點，描寫殖民地空間的禁錮，男性家長制的陰影，「南方」儼然是一個墮落的殖民地隱喻，也是葬送女性青春的墳墓。但是到了1930年代末期，她開始重新詮釋臺灣，〈南方的語言〉（1941）透過木村花子的命運流轉，寄託殖民地成爲日人女性新故鄉的政治寓言。這兩篇小說的敘事轉折，也印證真杉靜枝的文學轉折。從女性之墓到女性新故鄉，日人女性作家的土地認同，既投射對男性家國體制的欲拒還迎姿態，也不乏地理空間的豐饒想像。透過她的作品，可以看出當時她對愛情的期待、時代的焦慮、甚至國家的想像。

關鍵詞：南方、殖民地、新故鄉、真杉靜枝、臺灣意象

ⁱ 國立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Colony As New Homeland :
The Image of Taiwan in Masugi Shizue's Short Stories:
"Tomb in the South" and "Language of the South"

Chiu ,Ya—Fangⁱ

Abstract

Masugi Shizue was a woman writer who grew up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rule on the isl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 and "homeland" had been the major concern in her writing project. The short story "Tomb in the South" was seen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 among her early works. It, from the viewpoint of Japanese woman, depicted colonial space as a prison overshadowed by patriarchal dominance. "South" was like a metaphor of colonial degeneration and was no difference to the tomb that buried the youth of women. However, toward the end of the 1930s, she began to reinterpret Taiwan with the short story "Language in the South", in which the protagonist Kimura Hanako's fate was elevated to a political allegory implying that the colony had become Japanese women's new homeland. Thus, the literary turn of Masugi Shizue was embodied in the narrative turn as exemplified in these two stories. When the tomb was turned into new homeland for a woman as reflected in the stories, this writer's national identity ambivalently

ⁱ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expressed her resistant and embracing attitudes toward male state system. These works fully exposed her eagerness for love, her anxiety over wartime, and her imagination of nation—state.

**keywords : South Colony New Homeland Masugi Shizue
Image of Taiwan**

一、引言

真杉靜枝（1900—1955）幼年跟隨家人來臺灣定居，是在殖民地成長的女性作家。¹ 1927年，真杉靜枝發表處女作〈火車站長的年輕之妻〉，以自己的故事為模型，描寫一位年輕女性陷入婚姻生活的苦悶，整天耽溺於幻想以自慰。故事場景的舊城，籠罩著荒涼破落的氛圍，儼然是一座埋葬女性青春的墳場。臺灣作家葉石濤在追溯舊城印象的文章中，不僅提及這部作品，也談起真杉靜枝和舊城的因緣：

青春時代，我對舊城這個地方有模糊的認知。那認知來自於灣生（臺灣出生）的日本女作家真杉靜枝的短篇小說，名叫〈舊城驛長之妻〉。舊城驛長指的是舊城火車站站長。原來真杉念完高中，只是十七歲的少女時，她的爹娘硬把她嫁給年齡懸殊的火車站站長。日本人的封建陋習似乎也和咱們不相上下呢。血液裏流著熱情奔放的追求意願的真杉，耐不住這窮鄉僻壤的寂寞生活，後來離家出走，跑到日本本土去當起作家來，聲名狼藉，換了好多個情人。不過，蓋棺論定，她可沒留下什麼好作品，似乎緋聞比小說強。²

¹ 真杉靜枝 1915年（大正4）進入臺中醫院附屬的看護婦培訓所受訓，1916年從培訓所畢業之後在臺中醫院工作。當時她被邀請參加醫院內的文學集團，從而展開對文學的關心。不過她的看護婦生涯並不長，1918年在父母的強制命令下辭去醫院工作，和任職臺中火車站副站長、31歲的藤井熊左衛門結婚，那一年她才18歲。後來由於無法忍受和丈夫的婚姻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對文學懷抱憧憬，1922年（大正11）毅然決定離家出走回到日本內地。抵達日本之後，她先暫時借住在大阪的外祖父母家中，然後在基督教青年會YMCA會館定居下來。1924年就職『大阪每日新聞』成為女性記者。1927年，真杉靜枝遷居東京，從此展開文學生涯，該年發表處女作〈火車站長的年輕之妻〉（〈駅長の若き妻〉，《大調和》，1927年8月）。

² 葉石濤，〈在拱辰門月亮下〉，《展望台灣文學》，（臺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頁213—214。

葉石濤的發言，涉及他個人的文學品味，不過關於真杉靜枝的部分，有些輕率。真杉靜枝在臺灣成長，卻非在臺灣出生。顯然他也曾聽到一些關於真杉靜枝與男性作家交往的流言或緋聞，因此對她的評價不高。令人好奇的是，葉石濤是否看過真杉靜枝的全部作品？真杉靜枝的文學生涯起步於 1920 年代末期，1940 年代是她創作活動最為顛峰的階段，當時出版過響應戰時國策的作品《囑咐》、《南方紀行》、《妻》³，可以說是頗具知名度的作家，不過她在戰後所得到的文學評價並不高。在日本文壇的歷史上，真杉靜枝和武者小路實篤、中村地平、中山義秀等男性作家的感情事件，顯然比文學才華更為可觀⁴。透過葉石濤的話，不難窺見她在臺灣似乎也留下類似負面的印象。不過，臺灣學界對於真杉靜枝的討論，目前才在起步階段而已⁵。成為女作家，或許是真杉靜枝尋求獨立的方式。儘管世人多以負面態度議論她的情感生活，但是她肯定也從這些經驗中獲取書寫的力量。值得深思的是，她如何以書寫為策略，在男性世界中發聲。所以本文將真杉靜枝的臺灣經驗與戰爭時期的文學活動置放在大時代的歷史脈絡下審視，透過性別與民族的位階，檢視一位女性作家的文學轉折，並藉

³ 真杉靜枝在 1920 年代末期，開始展開文學活動，1938 年（昭和 13）發行的創作集《小魚の心》（竹村書房）是她第一本出版品。1939 年到 1942 年的幾年間，可以說是她創作產量最為顛峰的時期，陸續出版下列作品：《小魚の心》，東京：竹村書房，1939 年 10 月；《南方紀行》，東京：昭和書房，1941 年 6 月；《ことづけ》（囑咐），東京：新潮社，1941 年 11 月；《妻》，東京：博文館，1942 年 2 月。

⁴ 火野葦平，〈淋しさヨーロッパ女王〉（寂寞的歐洲女王），《新潮》，1955 年 1 月号；平林たい子，〈真杉靜枝さんと私〉，《文芸春秋》，第 48 号，1955 年 10 月，頁 62—68；石川達三，〈花の浮草〉（花之浮草），東京：新潮社，1965 年。

⁵ 關於真杉靜枝的討論，臺灣學界屬於起步階段。據筆者所知，目前只有三篇中文論文發表，分別：林雪星，〈兩個祖國的漂泊者：從坂口禿子的《鄭一家》及真杉靜枝的《南方紀行》《囑咐》中的人物來看〉，《東吳外語學報》，第 22 期，2006 年 3 月，頁 39—64；吳佩珍，〈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與內台結婚問題：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第 12 期，2008 年 6 月，頁 45—62；李文茹，〈殖民地・戰爭・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臺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第 12 期，2008 年 6 月，頁 63—80。

此探索日本統治時代在臺日人女性的身影。

1934年（昭和9），真杉靜枝發表以高雄舊城為背景的小說〈南方之墓〉，描寫一群生活在殖民地南部的日本人身影，在這部作品中的幾位年輕女性角色，分別受到了父權家庭父權的婚姻支配、身體暴力或經濟控制。真杉靜枝在作品中以女性觀點強烈批判父權家庭，更指出是殖民地的落後文化氛圍致使日本男性的人性愈加低落。作品末尾，一位女主人公選擇自殺以擺脫丈夫的監控。這篇小說以日本女性的「墳墓」來隱喻臺灣，南方的蠻荒意象也不言可喻，可說是她早期創作意識的代表⁶。也是從1934年左右，真杉靜枝和中村地平正式交往。對置比並他們兩人在1930年代初期的殖民地書寫，臺灣的南方意象分別指涉了殊異的內涵。在臺灣有過一段不愉快婚姻的真杉靜枝，對於殖民地的心情寫照，顯然和中村地平在青春時期的南方憧憬有豐富的對話空間。1939年春天，真杉靜枝和中村地平同行來臺，對兩人來說都是再度造訪臺灣。這次的旅行目的，中村地平是為蒐集小說材料，真杉靜枝則是來探望生病的母親。旅行除了文學與親情的理由，他們也協議此行後要正式分手，而稱為兩人感情的「畢業之旅」⁷。在1939年返日之後，倆人在臺灣想像的創作視野都不約而同出現轉向⁸。

⁶ 自從處女作〈駅長の若き妻〉（火車站長的年輕之妻，《大調和》，1927年8月）發表後，真杉靜枝書寫一系列以自己在臺灣的婚姻經驗為題材的作品，包括〈異郷の墓〉（異郷之墓，《若草》，1929年1月），〈南方の墓〉（南方之墓，《桜》，1934年1月）〈南海の記憶〉（南海的記憶，《婦人文芸》，1936年8月）。請參閱李文茹，〈「蕃人」・ジェンダー・セクシュアリティ：真杉靜枝と中村地平による植民地台湾表象からの一考察〉，《日本台湾学会報》，第7号，2005年5月，頁130—131。

⁷ 林真理子，《女文士》，東京都：新潮社，1998年，頁195。

⁸ 關於中村地平創作主題的轉變，請參考筆者，〈南方與蠻荒：以中村地平的《台灣小說集》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第8期，2006年6月，頁147—176。

在中日戰爭爆發後，真杉靜枝開始以女性作家的身分直接響應戰爭，〈南方的語言〉就是該期的作品之一，它涉及了介入殖民體制的語言同化問題⁹。真杉靜枝以自發性文學行動協助帝國的戰時體制，尤其1939年從臺灣返日後，在創作上積極強調自己和臺灣的關係。真杉靜枝能夠以女性作家的身分參與戰爭，事實上與她的殖民地成長背景經驗有著密切關係¹⁰。從〈南方之墓〉到〈南方的語言〉，真杉靜枝對於臺灣的情感呈現三百六十度的逆轉。兩部作品的主角都是年輕日本女性，前者以奔逃的姿態狼狽出走臺灣，後者則選擇臺灣做為安頓身心的新故鄉。把這兩篇作品並置討論，相當鮮明呈現出她對殖民地的排斥或認同，映襯出戰爭期南進政策所喊出的雄壯口號「要有死在南方的決心」是絕對的男性語言。真杉靜枝的文學轉折，在她的臺灣相關作品有相當明顯的衍變。從女性之墓到女性新故鄉，日人女性作家的土地認同，既投射對男性家國體制的欲拒還迎姿態，也不乏地理空間的豐饒想像。

二、奔逃的女人：〈南方之墓〉的父權隱喻

真杉靜枝的處女作〈火車站長的年輕之妻〉，發表於1927年（昭和2）8月¹¹，可以說是一部以自己在殖民地的婚姻經驗為主題的私小

⁹ 真杉靜枝，〈南方の言葉〉（南方的語言），收入《ことづけ》（囑咐），1941年（昭和16）11月發行。本文引用之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解說，《ことづけ》，（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19；【台灣編】7），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年9月發行，頁3—20。

¹⁰ 李文茹，〈殖民地・戰爭・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第12期，2008年6月，頁63—80；吳佩珍，〈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與內臺結婚問題：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第12期，2008年6月，頁45—62。

¹¹ 真杉靜枝，〈駅長の若き妻〉（火車站長的年輕之妻），《大調和》，1927年（昭和2）8月。

說。從這部作品以降，她持續發表系列創作，包括〈異鄉之墓〉（《若草》，1929年1月）、〈南方之墓〉（《桜》，1934年1月）、〈南海的記憶〉（《婦人文芸》，1936年8月）等，把少女時期的不幸婚姻陰影，轉化成爲文字，在揭傷言痛之餘，也達到身心的救贖，更藉此宣示逃離殖民地的義無反顧。〈南方之墓〉可以說是她的早期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描述臺灣的日人女性，被停滯不前的低氣壓所籠罩，生活在窒息煩悶的父權世界，一生的幸福全都掌握在父母，縱使遭受到丈夫的暴力相向，也得不到至親的身心支援。〈南方之墓〉透露出繁複的視角。從殖民者的立場來看，日人女性縱使沒有國族認同的疑慮，也無法脫離父權的龐大陰影。從現代性的角度而言，作者則指控是殖民地的落後文化讓日本男性的人性更加退步。「南方」是一個墮落的殖民地隱喻，也是葬送女性青春的墳墓。

〈南方之墓〉在某些情節上，來自真杉靜枝的私人經驗。1900年（明治33）在日本福井縣出生的真杉靜枝，是以私生女身分誕生於世。當時父親真杉千里已有原配，卻和少女みつゐ展開不倫之戀而生下靜枝。1901年千里和同居妻子斷絕關係，與みつゐ正式結婚。隨後，千里任職神官，全家移居臺灣。追溯真杉靜枝的身世，可以發現她的出生即帶有原罪。不難窺探真杉一家來到臺灣，並非南方憧憬，而是難堪的戀愛關係以致無法在故鄉生活，所以選擇移民之途。不過千里對於みつゐ，有強烈的感情成分，真杉靜枝的第一次婚姻，則是在沒有愛情的基礎下，接受父母之命嫁給年長自己13歲的臺中車站副站長藤井熊左衛門。在他們結婚不久，藤井熊左衛門就調職成爲舊城車站站長。真杉靜枝不滿二十歲即當上站長夫人，成爲眾人欽羨的對象，但是她的婚姻生活卻是地獄。真杉靜枝不是溫順聽話的女孩，常遭到丈夫暴力相向。此外，藤井熊左衛門在婚前已經有一位同居人，

婚後也常流連妓館，她甚至被丈夫傳染淋病，因此終身無法受孕。真杉靜枝在新婚初期就對丈夫絕望，四年的婚姻生活，更帶給她巨大的身心煎熬，造成她奔回日本的動力。

如果不知道真杉靜枝的成長史，恐怕就難以理解她在〈南方之墓〉的悲憤心情。從幼年到少女時期的殖民地經驗，尤其是婚姻的屈辱回憶，形塑她對臺灣的敘事主調；臺灣是精神的廢墟，女性的墳墓。在這一部短篇小說中，描寫三位年輕女性：火車站長的女兒，警察部長的女兒，醫師夫人，她們在殖民地的生活，完全操控在家長／男性手中，弱勢的處境使她們萌生反抗意識。最後，火車站長女兒選擇奔逃，醫師夫人則步向自我毀滅。其中，警察部長女兒妥協父母所安排的婚姻，但是誰能預測她的下場？

火車站長女兒一角，頗能看見真杉靜枝的影子。和小說不同的部分，則在作者的父親一直擔任神官之職，並非舊城火車站長，舊城火車站實際上是她丈夫任職的所在，這個地理位置曾經占據她晦暗人生的一部分，因此真杉靜枝以舊城為背景，更以火車站作為重要的場景。火車站的現代化象徵，舊城的荒廢意象，兩者剛好形成強烈的對比。臺灣縱貫鐵道從北向南延伸，在南端有個名叫「舊城」的車站，來到這裡的旅行者，一眼望去，可以看到廣大的田野，以及矗立在雜草叢中的中國式古城：

小村莊被台灣獨特的竹林所圍繞，從此處傳來生活的噪音，可以聽見小狗和鵝隻的鳴叫聲。廟會的時候有爆竹，美麗的月夜中則傳來啾啾嗚嗚的胡琴哀調。

水牛的泥臭味，豬舍的甜醋酸味，混雜流淌其中，土人的小孩們赤腳走過。

在這裡，還是有內地人居住；穿著內地的和服，講著七分台灣話，在這種村莊生活著的內地人們¹²。

在這偏遠鄉下的小村莊中，充滿各式的噪音，動物、爆竹、胡琴的聲響，就是當地的生活情調。除了熱鬧的聲音，還有家畜的氣味混雜流淌其中。因為是漢人部落，住民以臺灣人居多，不過也是有內地人。誠如作品中描述，像火車站長或是警察部長，只要一張派令，無論多麼窮鄉僻壤也得接受前往。不過，小說裡也提到的一些內地人，他們並非公職背景，卻有如花粉隨風飄落到這個土地，展開異鄉體驗的人生際遇，如理髮師、醫師等人。派遣至此擔任警察部長的唐山先生，在這個村莊的地位與權勢，就如同日本古代的領主一般。那棟雄偉華麗的警察局，聳立在臺灣風的土磚房屋當中顯得相當醒目，散發出威嚴的力量，也是權力的象徵。警察部長的唐山氏出身鹿兒島，二十年前接受派令，帶著妻子來到殖民地。在臺灣的長年生活中，依靠部長夫人的手腕，不僅順利養育六個小孩，也累積可觀的家產和儲蓄。縱使必須離家背井，每天面對臺灣人，但是來臺任職的辛苦代價，是豐厚的退休金，他們也算沒有遺憾。眼前所要關心的，則是兒女的婚事。他們的長女，正值花樣年華：

唐山家的長女，已經滿十八歲。因為看婦人雜誌而學會美妝技巧，她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是穿過土人村莊，散步到火車站。

為了剛好趕得上配合旅客列車通過車站的樣子，她不由得加快腳步往車站去。

¹² 真杉靜枝，〈南方の墓〉（南方之墓），《桜》，1934年1月。日文部分係參用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別卷【內地作家】），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7月初版，頁268。

旅客們在這樣簡樸的火車站中，看到妝扮美麗的像野薔薇般的女孩那拼命想讓人看見的身影，一面覺得我見猶憐，一面還是就這樣離開了¹³。

這個女孩的身姿，也可能透露了作者的青春情懷。一位對愛情滿懷憧憬的少女，積極地吸收婦女雜誌的時尚訊息，把流行的彩妝化在自己臉上，並期待能吸引他人的目光。然而，村莊的年輕日本男人極爲稀少，爲了展現自己的美貌，她每天一次，走到人潮最聚集的車站，因爲那裡有很多旅客。對她來說，旅客們的讚賞眼神是她一天當中最感成就的時刻。但是舊城是個小站，很多人過站不下，從車上眺望這個女孩的旅客，應該有人看穿在她的美麗外表下，是一顆多麼騷動不安的心。一個害怕在舊城老去的焦慮靈魂，急欲展現她的美好形貌，透過刻意的妝扮，然後突兀地出現在車站。然而，她的「化裝」，卻赤裸裸地把內在表露無遺，她渴望被看見。〈南方之墓〉的「舊城」，是地理的邊緣，也是文明的廢墟，火車越往南行，和現代都會越背道而馳，火車站恐怕是當地最摩登的中心位置。在這個百廢待興的小城，長久呼吸停滯的空氣，年輕女孩可能在不知不覺之間就衰老了，唯有來到火車站才能夠感受新鮮的氣息。

另一方面，警察部長女兒的形象，訴說了女性的孤立無援。從去年迄今，她的閨中好友、火車站長女兒年出嫁別處之後，她失去親密對話的人。在偏遠鄉下，和她同年的女孩微乎其微，也不可能找漢人玩伴，寂寞情事更爲難遣。因此當她聽到站長女兒和丈夫吵架而跑回舊城，她急忙去和好友相見，兩人再度來到以前的秘密場所談心。一

¹³ 真杉靜枝，〈南方の墓〉，《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別卷【內地作家】），頁 270。

年的別離，她們也細微察覺出彼此的差異，而陷入無言尷尬的局面。終於，火車站長的女兒打破沉默，以過來人的姿態告誡好友：「無論如何，沒有愛情的婚姻是行不通的。」自己成爲婚姻的實驗者，被不愛的男人奪走處女，這是怎麼說都令人遺憾的事。無法抑制的眼淚，是自悔也是自憐。丈夫耽溺於酒色，經常在外過夜。平常在家裡也是作威作福，只要不順其意，就是拳頭以對。這種現象，也不只她家如此：

走到哪裡，女人都只是被使喚的下女。這種愚蠢的習慣，肯定是殖民地的緣故，所以還殘留著。在文化光明的內地，男性必然不會有毆打女性那樣的氣燄¹⁴。

在殖民地，日人女性不僅被物品化，也被奴隸化，是男性家長任意擺布的擁有物。如果是文化進步的內地，男性一定不敢過度驕傲自滿，至少會披上文明的外衣，不會對女性使用暴力。作者會寫出這段話，也和臺灣的養女與蓄婢風氣有關¹⁵。站長的女兒以這些話作爲一年婚姻生活的實驗感想，並且透露自己想要離婚並且前往東京的決心。但是這些事只能對好友傾訴，卻無法向家人傳達。因爲她知道父母希望她能和丈夫復合，不可能支持她離婚，也會極力勸阻她的出奔舉動，所以尚未透露絲毫訊息。這項決定，意謂著未來的艱辛。在聽完站長女兒的告白之後，部長女兒突然小聲的回應，她也無法接受沒

¹⁴ 真杉靜枝，〈南方の墓〉，《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別卷【內地作家】），頁 272。

¹⁵ 日治時期的女性解放運動，對於臺灣女性的地位有重大改革，但是查某嫻（婢女、女僕）的解放程度並不普及，成果也不大。主要是擁有者難以放棄自己的利益所致。竹中信子回憶自己在 1940 年（昭和 15）還很容易看到住家附近有查某嫻的存在。請參閱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田畑書店，1996 年，頁 182—183。

有愛情的婚姻。原來父母已經幫她尋找到對象，是警察局裡的部下，也是村裡唯一的單身日本人，因爲積極儲蓄的習慣而受到唐山夫人的讚賞，卻是有張蒼白臉孔的人。這個男人被部長女兒所厭惡，站長女兒也站在前輩的立場認真警告她，要堅決反對到底。但是，十天之後部長女兒卻傳來一封信給站長女兒：

「我畢竟是非常不幸的女孩。母親認真地分析我聽，像我這樣的人，絕對無法擁有自己期待的丈夫；女學校也沒畢業，沒有資格反對父母的安排。請同情我的處境。你也是，還是應該回到丈夫身邊吧。」¹⁶

唐山夫人對女兒說的話，確實是最實際的考量¹⁷。小說的時代背景，應該在 1920 年前後，當時還未積極提倡內臺融合，一般日本人之間通婚是理所當然。他們移住臺灣已經二十年，和內地親戚的聯繫已經淡薄，在當地能夠找到單身男性已是可喜可賀。另一方面，唐山家的長女既沒知識背景，也無一技之長，如何吸引傑出的年輕日本男性？最後她終於妥協家長的安排。年輕女孩終歸無法抗拒現實世界的壓力，站長女兒讀完信之後，感覺身體像被火灼身一般炙熱。面對昔日好友的規勸言辭，她知道兩人已經愈行愈遠，除非對方也能在婚姻中得到覺悟，否則她們不會再有心靈交集。此時此刻，她更是深刻感觸到自己又回復到孤獨一人。因爲連她的至親也不支持。母親看到她

¹⁶ 真杉靜枝，〈南方之墓〉，《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別卷【內地作家】），頁 273。

¹⁷ 來臺日人到了適婚年齡，因爲居住在殖民地，不太可能透過日本內地的親戚或友人介紹對象，婚姻成了一大問題，後來在 1920 年就出現「婚姻介紹所」。請參閱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田畑書店，1996 年，頁 182—183。

突然回家，不僅沒有同情女兒的遭遇，反而希望她回到丈夫身邊。她對著女兒痛哭流涕。但是那些眼淚並非為女兒而流，而是傷心女兒竟然拋開丈夫，這就形同失去經濟的依靠：

對於倔強女兒的不幸，母親每天都在女兒面前嘆氣給她看。整天看著這樣的母親，女兒不知不覺地感到自己被拋棄了。比起聽母親發牢騷，勝過回到會毆打自己，沒有求知慾的丈夫身邊
18。

不過對站長女兒來說，丈夫的低俗與無智，已經到了無法忍耐的地步，與其和他生活，不如回家聽母親的嘮叨。但是她也開始想要擺脫母親，尋求獨立的地位，看在母親眼中，自己辛苦養大的女兒，成為忘恩負義的他人。不過對女兒來說，母親的一生也被桎梏於殖民地之中，只希望求取穩定的生活。當女兒宣示要脫離丈夫展開獨立生活時，母親殘酷地說：「會死在野外」。母親的想法認為，女性終歸需要丈夫，那是經濟無虞的保證，尤其女婿已升任站長，離開他更是不智的決定。這位母親的形象，其實和真杉靜枝的母親相當接近，雖然個性頗精明能幹，卻是依存在父權體制下的女人。所謂父權體制，乃是在家庭中由年長男性掌握權威的制度。男性不僅是經濟體系的主宰，也是知識體系的主體。在權力的論述建構下，父權思維也複製給女性，所以家庭中的年長女性，往往是父權結構的共犯者。〈南方之墓〉中的火車站長，是一個隱形的人物，作者幾乎沒有描寫。他藏身在女性背後，只由母親發言，但是他對女兒握有絕對的支配權，而當女兒

¹⁸ 真杉靜枝，〈南方の墓〉，《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別卷【內地作家】），頁 274。

結婚後，權力則全部轉交到她丈夫手中。顯然，站長女兒的婚姻並非個例，而是通例，警察部長的女兒，也將步上同樣的命運。

在〈南方之墓〉還描寫一位女性，她是來到當地執醫的內地人醫生之妻。這位醫生的來歷不明，鮮少與人坦誠相對。他租用臺灣人的房屋，在光線陰沉的屋內，僅僅陳列稀落的藥瓶，絲毫沒有現代診所的規模。他甚至被村人傳聞是個沒有執照的密醫，幾乎沒有任何患者造訪。但是，在這個晦暗的房子，他那清瘦且相當漂亮的年輕妻子總是無所事事地坐在其中。這位身材矮短、年過四十以上的中年醫生，竟然擁有如此年輕貌美的太太，最令村人感到不可思議。兩人之間的結合，其實和金錢糾紛有關，更涉及一個女性的悲史。她在 16 歲的青春年華，一心想要從事表演工作，所以從繼母家出走，投奔巡迴演出的劇團而來到臺灣。但是劇團在臺灣沒有發展機會，又碰上經濟不景氣，最後她竟然被團長出賣，在臺南成為藝妓。沒有多久，她開始出現肺病症狀，又被臺灣人傳染到梅毒，因為醫療費用，不知不覺間她的負債高築。這個時候，留著絡腮鬍的醫生出現，提出結婚的條件，答應幫她贖身並還清債務。嫁給醫生，不僅可以解決欠債問題，又能得到醫療的幫助，她答應了醫生的要求。兩人在結婚後不久，丈夫就以養病的理由，把她哄到這個鄉下地方。但是來到舊城之後，卻經常發生激烈吵架，引起附近理髮店老闆娘的關切。也是內地人出身的老闆娘，頗知悉醫生之妻的來歷，逢人問起便饒舌地傳述：「她過去是藝妓出身」：

醫師的妻子，不僅是藝妓，還是道地的江戶人。手指和下顎的地方，可以看到青筋透明浮現的樣子，身形蒼白削瘦。她自己說過有肺病，已經是第三期了，好像身為丈夫的醫生也仔細給

她診斷過，這樣說給她聽。

但是丈夫對於妻子有毛病，既不給她藥吃，也絕對不讓她一個人外出。連一分錢也不給妻子¹⁹。

身為醫師夫人，這名妻子卻是無產階級，丈夫以疾病和金錢控制妻子行動，她的身心彷彿遭到囚禁，整天只能坐在家中發呆。在這沉寂的屋子，死亡的陰影也逐漸靠近，感染末期肺病的肉身，已經逐漸敗壞。妻子病情加重，丈夫卻袖手旁觀，他的居心何在？如果是一具健康的年輕軀體，她恐怕無法安於室吧。兩人外貌與年齡的差距，造成丈夫的疑心，擔憂妻子會有離家出走的企圖。所以作為醫生的丈夫，故意不讓妻子服藥，也斷絕她的所有經濟來源。他們的婚姻生活，充滿了信任危機；丈夫懷疑妻子的忠誠度，妻子則指控丈夫的殺人欲。作為一位被支配者，妻子終於無法忍耐經濟的困窘與身體的病痛，寧願回到臺南的「家」。臺南是被夥伴出賣的地方，也是以肉體換取生存的歡場，此時此刻卻成為「家」的投射物，人生境遇之荒謬莫過於此。

對醫生之妻來說，所謂的「家」應該具備甚麼功能？她在養女時期，選擇離家，這是她第一次出走家庭。被賣到臺南的妓院後，她落入賣淫生活，像溺水後捉住一塊浮木般地嫁給醫生，然後來到舊城。舊城的家，是她成為人妻之後的居所。丈夫的佔有慾，使她陷在精神與肉體的雙重虐待。「家」的消極意義可以遮風避雨，積極意義能夠安頓情感，但是她卻連基本的滿足都無法獲取。如今被牽引到殖民地的南端之一角，她已經走投無路，無家可歸。最後，她決定要消失在

¹⁹ 真杉靜枝，〈南方之墓〉，《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別卷【內地作家】），頁 276。江戶是日本首都東京的舊稱，特別指以皇居為中心的東京特別區中心部。江戶之名稱，起源於 1457 年建立的江戶城。

丈夫的視線之中。某天夜晚，火車站前突然出現醫生張皇失措的舉動，四處向人詢問他太太的蹤影，引起村裡一陣騷動。沒想到，妻子已在舊城的斷垣雜草叢中，服毒結束自己短暫的一生，作為她最激烈的抗議。舊城，是她人生最後的落腳處，她的屍骨將埋葬於此。南方的南方，是墮落的深淵，是死亡的幽谷。醫生之妻如櫻花凋零般地失去生命，想必她的心中還有莫大遺憾。

在臺日人女性的成長、墮落與死亡，是真杉靜枝早期作品一再面對的結果，她的女性書寫是自我的傷逝姿態，告別少女歲月的祭弔書。耐人尋味的是，作者在描寫〈南方之墓〉三位女主人公時，都沒有為她們命名，而是用「站長的女兒」、「唐山氏的女兒」、「醫生的妻子」。這些稱謂指出她們的身分與歸屬，或為人子，或為人妻，都是家長的擁有物，也象徵有更多無名的「她們」存在。就家庭結構而言，她們是第二性；就經濟層面而言，她們是無產階級。毫無疑問的，這三位女性的形象塑造，以醫生之妻最為突出，也最具悲劇性，更點出「南方之墓」的命題意義。殖民地的父權隱喻最終指向了死亡，多少年輕女性的青春肉體在這裡衰老、天真夢想在這裡腐敗。在這座灰暗滯悶的廢墟，成為女性最終的埋骨之處，它的抑鬱陰影，消抹了女性的聲音與顏色。

文明一日沒有降臨，殖民地就是一個失樂園，具有邊緣地理與文明失落的廢墟象徵。作者意圖指控，殖民地的封建文化，召喚日人男性內心深層的劣根性，使日人女性沉浮在父權的餘威之下。換成內地的話，絕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日本已接受現代社會的文明洗禮，男性的父權欲望已被削弱。然而，文明越進步，人性有可能更墮落。權力利益的爭逐與佔有，是無關文明進退。真杉靜枝把壓迫女性的罪過推諉到殖民地，但是首先應該認清父權家庭的本質。對被壓迫的女

性來說，封建家庭體系的「家」即是「枷鎖」。家庭是男性權力的基礎，婚姻則使女性成為男性的財產，阻止女性追求真愛。男性長久以來將女性視為擁有物品，女性一直得不到經濟自主權與身體自主權。女性意識的覺醒，首先在於擺脫女性被物化的命運。父權體制的挑戰，也應從壓迫的原點「家」做起。〈南方之墓〉的最後一段，描寫站長女兒終於從家庭出走，這段情節也呼應了真杉靜枝的真實人生。女性的悲哀，莫大於此，因為壓迫者是自己的家長。離家出走，擺脫父母，是獨立的第一步。

小說末尾出現狼狽的父母身影，或許正是真杉靜枝家人的寫照。根據林真理子的《女文士》所描述，真杉靜枝的母親みつい是一位個性鮮明的人物。不過，真杉靜枝和母親的關係似乎並不和諧²⁰，從〈南方之墓〉也可嗅出一些緊張關係。然而她與父親卻有很深的情感，尤其在知道父母的戀愛史之後，她對父親充滿了同情與愛心。遙想當時，擔任小學教職的真杉千里已有妻室，卻迷戀上美麗的少女みつい，不惜與懷有身孕的妻子離婚，在家族間引起極大的震盪。千里的父親，是鄉里聲譽極高的醫生，兒子發生不倫戀情，對方且是小商人的女兒，不僅敗壞家風也與門第不配。真杉千里為了追求愛情，受到前妻與父親的雙面譴責，只好帶著みつい和出生不久的靜枝渡海來到臺灣。真杉千里出身師範學校，家中又經營醫院，如果留在鄉里肯定生活不虞匱乏，但是卻被迫到殖民地生活，擔任神官以換取全家溫飽。真杉靜枝始終覺得父親相當可憐，縱使自己的婚事是父母雙方安排，不過她埋怨母親的成分較多，對於父親則採取寬容的態度。她也在戰爭期

²⁰ 根據《女文士》的敘述文字，真杉靜枝認為自己被母親所憎恨，這顯然是出於女人與女人之間的忌妒。因為兩人的外表很相似，但是自己比母親年輕且貌美，這是母親みつい所無法忍受的事。請參閱林真理子，《女文士》（女作家），東京都：新潮社，1998年，頁57。

寫過〈我的父親〉一文，談到父親的神官工作狀況，這篇文章可以說是響應神道而寫，卻也傳達對於父親深切的孺慕情感²¹。

以私生子的身分誕生，真杉靜枝並非母親所期待的小孩，她很早就察覺到母親對她的排斥感。換一個角度來看，儘管みつい和真杉靜枝彼此有母女心結，她們其實擁有共同的宿命，兩人對於殖民地都有許多遺憾心情。背負偷情歡愛的「野合」罪名，真杉千里和みつい無顏待在鄉里，漂流浪蕩到臺灣，有家不得歸，在殖民地度過四十年以上的時光²²，這是みつい初嚐愛情禁果時所意料不到的人生。不過她卻將女兒推向沒有愛情的婚姻，最後迫使真杉靜枝離開臺灣；父母的家、丈夫的家，已無自己容身之處。爲了擺脫暴虐無明的生活，她以奔逃的姿態，跳脫封閉的舊城。回首來時路，一路戰戰兢兢，她害怕被丈夫與父母追回，更加覺悟「家」的荒謬性。事過境遷之後，她也曾揣想，如果當初生下丈夫的孩子，恐怕從此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會因爲孩子的存在而忍辱求生。或許被丈夫感染性病的不幸，可能解救了自己。這些不堪往事，是她念茲在茲的創作靈感。不難發現，真杉靜枝早期的創作風格，耽溺於不幸婚姻的家暴回憶，書寫這些「回憶」就是她不斷揭開傷痛、審視未來的獨立宣言。她寫殖民地空間的禁錮，南方也是殖民地的隱喻。南方與文明隔絕，是蠻荒的所在，日人女性的墳場。荒草蔓蔓，〈南方之墓〉有感傷自戀的風情，也有亟欲突破男性重圍的企圖。

²¹ 真杉靜枝，〈私の父〉，《婦休三日間》，大阪：全國書房，1943年（昭和18）發行。本文引用之復刻本係由長谷川啟監修，《婦休三日間》（〈戰時下〉の女性文学：14），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2年5月發行，頁215—218。

²² 根據十津川光子的描述，真杉靜枝在和中山義秀離婚之前，把父母從臺灣接到日本。他們婚姻從1942年開始，至1946年結束，所以她的父母應該是1940年代中期左右返日。請參閱《惡評之女：ある女流作家の愛と哀しみの生涯》（惡評之女：一位女性作家的悲歡生涯）東京都：虎見書房，1968年，頁109—110。

三、 殖民地新故鄉：〈南方的語言〉的書寫策略

爲了探望生病的母親，1939年（昭和14）真杉靜枝和中村地平同行，回到睽違已久的臺灣。兩人達成約定，在旅行回國後就正式分手。這一年，她失去了愛人，卻重獲親情，消解與母親之間的惡劣關係。也是1939年之後，真杉靜枝的創作方向逐漸拋開殖民地的傷痛，轉而重新投注情感。把〈南方之墓〉與〈南方的語言〉並置對照，可以發現明顯的轉變。如果說〈南方之墓〉是南方頹廢的死亡意象，〈南方的語言〉則有劫後再生的生機隱喻。這兩篇作品表現出作者強烈的情感轉折，凸顯對於南方的憎惡與愛情。作者敘事姿態的轉變，不僅是親情的重拾，也和戰爭時局有密切關係。一樣的臺灣，兩樣的心情，以殖民地爲場景，她重新發現了南方。

從1939年到1940年代初期，真杉靜枝的創作行動相當活躍，尤其是以派遣作家身分從軍，在1940年與1942年前往中國訪問。戰爭局勢的炙熱化，對於真杉靜枝的作家生涯是一大轉機。真杉靜枝擅於從臺灣汲取靈感，抑鬱的殖民地經驗，曾幾何時，已能轉化爲明朗的鄉土書寫，鮮明展現文學動員的姿態，也成爲真杉靜枝的文學特色。日人女性作家在戰爭時期作爲筆部隊的一員，終於可以和男性作家同進同出，共同爲日本帝國的南進之夢挺進。回顧世界的歷史，女人歷來都是被國家／男性權力摒除在外的客體，唯有當男性政權發生危機時，他們才會要求女性共體時艱。真杉靜枝自覺到時局所趨，她主動出擊，一頭栽進南方暖暖的新故鄉敘事。

耀眼的陽光，成熟的果香，殖民地的亞熱帶意象在〈南方的語言〉第一段文字即清晰可見。這部小說以臺灣南部傳統農村爲背景，描寫

一位日本女性木村花子經歷失敗的婚姻，在走投無路的窘境下來到臺灣投靠友人卻未竟，意外邂逅人力車伕的李金史，毅然嫁入李家成為臺灣人媳婦。善良的丈夫和婆婆，讓木村花子重新感受家庭的溫暖，臺灣作為她從此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成了她的新故鄉。「國語」（日語）政策與日臺通婚，是這篇小較為鮮明的主題，但是日人女性的「家」之所在，恐怕是作者念茲在茲的書寫企圖。故事的情節，從殖民地官吏為了國勢調查（戶口調查）而造訪花子一家談起²³。

在臺灣人式的家屋中，李家的老婦為了官吏的即將到來而緊張，大聲呼喊她的媳婦「阿花」，屋後傳來年輕女子用臺灣話回應婆婆的聲音。被稱為「阿花」的女孩，就是木村花子。相對於婆婆慎重惶恐的態度，阿花卻表現出輕鬆自在的神情。從文字的描述中，阿花是一位體態豐腴的美麗女子，她的穿著與口音已和臺灣婦女無異，不僅熟悉臺灣話，也是家事的勞動者。李家唯一的財產就是豬舍裡所圈養的豬隻，餵食與清理的問題都由阿花負責。漢人的生活文化和「豬」有

²³ 在日治時期，為了有效掌握殖民地的各種情報，統計調查事業的推動是相當重要的基礎工作。其中，又以國勢調查位居各種統計調查事業之根本。臺灣早在 1905 年以「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為名，推動國勢調查作業。1905 年後藤新平發布「戶口規則」，以「戶口調查」之名，同時達成了三個目的：一個是「國勢調查」，一個是求得警察治安資料，另一個是作成臺灣人民的戶籍。臺灣「戶口制度」的基本架構，原則上是在 1905 年的「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後確立的。根據「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所得資料作成全臺灣居民的「戶口調查簿」後，將原來由地方「街庄役場」管理的「戶籍簿」作廢，改以新的「戶口調查簿」取代之。此後，依據「戶口規則」，所有臺灣居民的「人籍」與「戶籍」事務全部由警察管理。「戶籍」政策與一般行政政策不同，不能先從做得到的地方開始進行，然後逐漸擴大範圍，而是必須全體同時實施的。當時臺灣的地方「街庄役場」沒有能力辦理戶籍事務，因此由領臺以來一直在全島從事維持治安工作的警察單位負責處理。其實，全臺灣的警察相關單位數量是地方街庄役場數量的兩倍多，熟悉當地語言的警察人數也遠遠超過街庄役場人員。另外從法令根據方面來看，舊慣調查尚未結束，在舊慣立法基本資料不足的「現實」條件下，後藤新平所採取的「人籍」與「戶籍」事務合併處理的「戶口制度」，可以算是最適合當時臺灣社會狀況的政策。請參閱阿部由理香，《日治時期台灣戶口制度之研究》，（淡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0 年）。

久遠淵源²⁴，小說所呈現出來的景像，無疑是屬於庶民大眾的底層情調，而且也看出木村花子已經相當融入臺灣人媳婦「阿花」的生活。

木村花子出生於東京築地附近，父母在她少女時代已經過世，也沒有任何兄弟姊妹。利用僅有的遺產在女校完成學業後，旋即嫁爲人妻，踏上婚姻生活，不過卻以離婚收場。婚姻失敗的同時，她的人生也陷入技窮途拙的窘境。花子在幼年時代有一位好友，和殖民地官吏結婚而嫁到臺灣，她想起這位朋友，在自己也不知所以然的情況下，突然決定前來投靠。到了臺灣之後，才打聽到朋友已經不在人間，意料之外的結果反而使她鼓起勇氣，決意留在臺灣發展。但是下一步該怎麼辦呢？眼看當晚的落腳處都成問題，想要到警察局請求協助時，花子坐上李金史的人力車，初次見面就讓她留下深刻印象。吸引花子的原因，在於李金史的日語相當流利，幾乎分辨不出是臺灣人。兩人開始交談後，因爲語言溝通無礙，不知不覺中花子道出她的困頓處境。花子當下也在暗自思索，是否能夠藉助這個男人步向新的人生：

李金史和她，就在這樣的機會下相遇。她想到去那裡的官廳之後要把自己的故鄉和身世全部說出時，就覺得很厭煩。從而，也思索著這個年輕的車夫是不是可以幫助自己重新出發呢？²⁵

正要前往警察局的時候，花子遇見李金史。兩人邂逅後的進展，與其說是命運的安排，不如說是花子的投靠姿態。到當地官廳求援，

²⁴ 在傳統漢人農業社會家庭，豬是屬於家畜，牠通常都被圈養在廁所旁邊，人的糞便等排泄物就是牠的飼料之一，而牠又成爲人的食物被吃進肚子，人消化後又排泄糞便讓豬吃，這是一種食物文化的循環關係。

²⁵ 真杉靜枝，〈南方的言葉〉（南方的語言），收入《ことづけ》（囑咐），1941年（昭和16）11月發行。本文引用之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解說，《ことづけ》，（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19；【台灣編】7），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年9月發行，頁11。

是安全無虞的考量，但是向警察述說自己的身世，卻有難堪的心情。她選擇李金史作為傾訴的對象，換一個角度來看，花子跟李金史談話時，也在釋放求助的訊息。這是木村花子的人生轉折，也是真杉靜枝的敘事轉折。〈南方之墓〉的女性，為了逃離殖民地的沉鬱壓抑，有人被迫自殺，有人遠走臺灣。〈南方的語言〉卻以主動換取被動，透過親身實踐，女性積極追求愛情與人生。這是作者所終生追求的，她更在木村花子身上找到自我救贖的希望。

李金史收容了木村花子，進一步發展感情，在相處半個月後就決定結婚。誠然，這部小說指涉臺日通婚的可行性與浪漫性。提倡「內臺融合」，是殖民者的理想，但它終究不容易達成。因為日本人與臺灣人在民族位階上，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無可避免權力之間的利益衝突。但是真杉靜枝卻採取逆向敘事，她讓花子成為一個融入殖民地社會的臺灣人媳婦「阿花」，甚至會說流利的臺語。另一方面，當官吏來到李家調查戶口時，這位年輕的女孩，雖然衣著與外表滿身都是勞動後的污穢，卻使用得體又高雅的東京腔日語應對，令來訪人士刮目相看。大家都被木村花子的流轉身世所吸引，他們心中應該都有疑問：一個內地女學校出身的知識女性，為何願意待在臺灣的鄉下，和臺灣人一起過著勞動揮汗的樸實生活？

根據吳佩珍的研究，渡臺的日本移民，自明治期以來便被背負著負面形象，唯有內地的邊緣者才會出走至臺灣，流落至臺灣的女性更慣常地被貼上「性道德墮落」的標籤。因此，女學生出身而經歷婚姻失敗的木村花子，在性別或內地的社會階級都處於落勢，這也是她會和臺灣人車夫李金史結婚的原因。他們兩人的婚姻之所以成立，可說是帝國邊緣者的同質性結合。而真杉靜枝在此作品中對於木村花子因「愛情」而與李金史結合的安排，與她在早期作品中缺乏「愛情」

基礎婚姻的描寫形成強烈對比。爲了跳脫日本內部被壓抑的構造，內地女性試圖向海外奔逃，卻擺脫不掉再度成爲「帝國邊緣者」的命運²⁶。但是，換一個角度來說，成爲「帝國邊緣者」的木村花子，在殖民地獲得新生，不正是真杉靜枝的書寫策略。

曾經帶給真杉靜枝狂暴記憶的殖民地，在〈南方的語言〉重新賦予臺灣嶄新的鄉土氣息。木村花子和李金史的結合，除了愛情之外，還有語言作爲重要的中介功能。從語言層面去分析，乍到殖民地的木村花子，她必須自謀生路。李金史吸引花子的關鍵，即是日語的流利能力。李金史曾經被臺北的銀行家雇用爲車夫，所以有學習日語的環境。不過，這篇小說特殊之處，毋寧說是花子的雙語能力。對被殖民者而言，同時具備母語與日語是較爲平常的。但是花子嫁入李家之後，一方面積極學習臺語，一方面也引導婆婆學習日語。誠然，花子無可避免會接觸到臺灣的生活文化、風俗習慣，她會逐漸熟悉當地的語言，並非無理之事。花子不僅能夠融入殖民地生活，更成爲一位稱職的臺灣人媳婦。從而，她在面對戶口調查時的得宜舉止，雖然展現女性羞澀的一面，卻毫不畏懼並坦然面對殖民官吏的詢問，可視爲她對殖民權力的親和性²⁷。花子的柔軟身段，某種程度也呼應了同化政策與皇民化運動，這是有脈絡可循的。

日本殖民理念除了政經結構的統治格局，也注重殖民地人民的思想改造。1898年（明治31）日本在臺灣推動殖民教育，1937年（昭和12）中日戰爭以降更積極進行皇民化運動，以「八紘一宇」的團體精神，對殖民地臺灣的人民，從物質與心理兩方向，徹底去除舊守的

²⁶ 吳佩珍，〈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與內台結婚問題：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第12期，2008年6月，頁58。

²⁷ 高良留美子，〈真杉靜枝「南方の言葉」を読む〉，《殖民地文化研究》，第5号，2006年，頁165。

思想、信仰、物質等層面，使其成爲徹底的皇國子民。所謂「八紘一字」的團體精神，就是以普遍性的原則抹煞個別的差異，讓殖民地的人民遵守一致的日本人生活準則，朝向皇民之路邁進。皇民化運動是一種同化爲日本人的運動，而它所施行的範圍，幾乎涵蓋了人民的所有日常生活面。其中，語言的教化往往是影響層面最廣泛的。殖民母國的語言，負載殖民者的意識形態，語言與權力的交相爲用，莫過於此。在國語運動的推動下，日語成爲臺灣人的學習目標，臺灣話則被視爲低等的語言。弔詭的是，花子來臺灣二年之後，已經能夠說出流利的臺灣話。在戶口調查的同時，她成爲語言的翻譯者與中介者：

「阿花是一個好媳婦哦」老婦格外加深應酬的笑容對官員們這樣說。

「好了啦，媽，別這麼說」，花子突然喉嚨腫脹般，從嘴裡說出流利的台灣話。

官員們用明白而慰勞的眼光看著花子，覺得她從頭到腳怎麼看都不像內地婦人而有本島人的味道。²⁸

花子的外表與言行，令所有官員感到耐人尋味。「木村花子」與老婦口中的「阿花」是同一人嗎？他們無法理解，一位內地知識女性，下嫁給臺灣勞動階級男性，在窮鄉僻壤過著平凡的庶民生活，甚至婆媳之間對話是操用流利的臺灣話，這顯然超出一般人對於日臺通婚的想像²⁹。

²⁸ 真杉靜枝，〈南方の言葉〉，《ことづけ》，（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 19；【台灣編】7），頁 12。

²⁹ 殖民政策在 1932 年（昭和 7）年前半的重大課題是內臺融合，因此內臺人通婚法的實施成爲急務，1933 年實施通婚法。根據竹中信子的訪談紀錄，當時臺日通婚

爲了避免村人異樣的眼光，木村花子隱藏內地的身分，等待時機成熟才要公開一切。花子更決意將李家提昇成爲村裡的文化家庭。李家的成員中，婆婆是「最不進步」的人，因爲她不會日語。小說主題既曰「南方的語言」，難免啓人疑竇，因爲篇名充滿南方憧憬，「阿花」的臺語操作，更流露出對於南方語言的新鄉愁。然而，〈南方的語言〉之命題，並不在於宣示殖民地語言的混融性，這篇小說的最終目的，顯然意圖消抹「南方的語言」，而朝向「國語家庭」邁進³⁰。關於宣傳國語（日語）政策的描寫，最鮮明的部分應該是在李金史的七十歲母親。在花子嫁入李家後，婆婆開始熱衷學習日語，她的年紀雖然老邁，卻和學童一起在國語教習所上課，而且越來越進入狀況。花子的丈夫本來程度就好：「李金史的國語說得太棒了，幾乎讓人無法聯想他是臺灣人。花子覺得自己也該穿起和服，在附近的人面前以內地女性的姿態現身了。」³¹

在萬事具備之前，木村花子不僅在外貌上偽裝，連語言也是偽裝的。身分的「不可言說」，是因爲還未取得協調性。這種協調性，不是花子向李家靠攏的姿態，而是李家朝向國語家庭的和諧度。隨著婆婆日語能力的進步，全家約定以日語交談，操演「日語」成爲一種日

的情況，有日人男性與臺人女性，也有臺人男性與日人女性的例子。不過，他們多屬於社會中上階級或知識階級，沒有勞動階級臺人男性與日人之是女性通婚然的案例，請參閱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田畑書店，1996年，頁226—231。此外，當時日本婦女嫁給臺灣男性時，因為戶籍法尚未在臺施行，即使結婚幾十年，在法律上妻子的戶籍仍然設在日本或是變成無戶籍者，關於日本女性的戶籍問題，是日臺通婚者所迫切想立法解決的問題。

³⁰ 對於全家成員都用日語交談的家庭，殖民政府會頒予「國語家庭」以此獎勵。要成爲國語家庭必須提出申請，通過認定後可獲得證書、獎章及刻有國語家庭（國語の家）字樣的門牌，供其懸掛在住家門口上。「國語家庭」在當時不僅代表榮耀，也可以享有許多優惠，如小孩較有機會進入設備師資較好的小學校及中學唸書、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等。

³¹ 真杉靜枝，〈南方の言葉〉，《ことづけ》，（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19；【台灣編】7），頁20。

常生活的態度，甚至是美德。誠如吳佩珍的研究指出：至今為止「本島人阿花」的偽裝，隨著臺灣人夫家日語水準的提昇，已經失去偽裝的必要性，也表示公開木村花子日本人身分認同的時機已經成熟。³²除了語言的問題，花子公開身分的意義，在於宣告她和李金史婚姻的穩定性。花子如果一直待在內地，只是個平凡女子。來到殖民地之後，她遭遇到生命不平凡的考驗。內地人身分的曝光，或許會吸引異樣眼光，但是她因為愛情帶來自信，相信和丈夫會排除萬難：

如果跳開現在愛著丈夫的心情，只思考自己各種狀況的話，住在那裏都無所謂吧。她突然意識到這樣的心意時，認為女性的愛情真是具有奇妙的作用。雖然對於東京感到厭煩，但是現在，可以的話，也想和李金史一起回東京。如果自己擁有一份職業則不錯，也讓李再讀點書。——李和她都同年是二十七歲³³。

木村花子與李金史邂逅，是一個奇蹟性的相遇，從而滋生的愛，造成驚人的勇氣。花子認為，只要能和丈夫共同生活，哪裡都是自己居安的場所。南方，是丈夫故鄉所在，也是她終止流浪的歸宿，是她的新故想。不過，在情感得到滿足後，她也思考回返東京的可能性。臺灣終究只是花子的人生跳板，她還是抱有「進步」的理想。南方的地方色彩，樸素舒緩，適合休憩療傷。東京的帝都色彩，則匯集文明與娛樂、機會與風險，是一個充滿魅惑的花花世界，令她欲拒還歸。花子的人生行旅，她想繼續走下去，而且帶著李金史。這種相濡以沫

³² 吳佩珍，〈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與內台結婚問題：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第12期，2008年6月，頁59。

³³ 真杉靜枝，〈南方の言葉〉，《ことづけ》，（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19；【台灣編】7），頁16。

的情感，是愛情的，也是母性的。在愛情萌長的同時，她的母性也逐漸被召喚。耐人尋味的是，在她的未來願景中，看不到婆婆的位置，這誠然是一種暗示。

不論是民族位階或是知識位階，花子顯然都高於李金史。她的委身相許，縱使愛情成分居多，也有策略性考量。以她先前的落魄處境，要獲得平等的愛情是奢望之事。花子以冒險的心情來到臺灣，將危機化為轉機，她決心放手一搏，自己選擇李金史以為終身依靠。李金史的日語能力已無問題，她期待能讓他接受更多的知識，以彌補臺灣人出身。眼看美好的遠景，已在花子腦海中逐步建構。然而〈南方的語言〉的故事，並不就此打住，小說末段情節急轉直下，

老太婆在路上被水牛的角度撞倒，抬回家中不到一個小時就死亡了，李家一片混亂。丈夫立刻從外面趕回來，跪倒在母親的屍體旁邊，一邊大聲痛哭，一邊罵出「幹你娘」。從來沒有像現在這一刻，讓花子湧起對丈夫的憐愛之情，而想要用手撫慰他。「幹你娘」在臺灣話裡可以說也是「畜牲」的意思。花子雙手抱著情不自禁怒吼的丈夫，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安慰他³⁴。

李金史正面衝擊母親的猝死，無法抑制憤怒的情緒，脫口而出的「幹你娘」，超越作者解釋的「畜牲」意義，而有更粗俗的文化暗示³⁵。令人側目的是，造成老婦死亡的兇手確實是一隻畜牲。日人作家對於

³⁴ 真杉靜枝，〈南方の言葉〉，《ことづけ》，（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 19；【台灣編】7），頁 20。

³⁵ 「幹你娘」按照字面意思雖然是傳達想要與對話者母親性交的意思，但罵人者不一定真的想要從事這項行為，只是想藉由這句話粗口間接地侮辱對方或發洩憤怒。不過，也有臺灣人以此為口頭禪，通常會被界定為文化水準較低下的人。

水牛形象的刻畫，顯然和臺灣人有極大殊異³⁶。真杉靜枝在《南方紀行》中的一篇隨筆，也曾經紀錄下她對臺灣水牛的印象³⁷。對臺灣人而言，水牛是溫馴的動物，也象徵庶民刻苦耐勞的精神。失控的水牛，失控的李金史，彷彿重疊的影像，形成劇烈張力。李金史一貫溫和的形象，於此出現戲劇化的轉折。作者刻意以臺灣話來表現李金史的悲憤，其實相當傳神。在最痛徹心扉的時刻，只有母語最能傳達哀者之慟。這一句臺灣話，也有極為低劣的意涵。不過在這篇小說中，這是李金史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使用臺灣話。李金史的脫軌行爲，透露出真杉靜枝對於殖民地男性的文化認同，還是保持遲疑態度。

李母的死，或許是成爲花子重返日本的契機。在此之前，花子已在盤算，殖民地是否可以成爲安身立命的新故鄉？臺灣作爲第二故鄉的地位，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此生若是在殖民地落地生根，恐怕就要自甘平凡了。他們兩人都還年輕，才27歲而已，有太多的未知橫擺在眼前，例如李母的死亡。面對丈夫喪母的悲痛，花子展現強韌的母性。不難看出，〈南方的語言〉的敘事策略，是以「母性特質」來強調女性與土地、子女的親密關係。「母親」是一個容易發揮的議題，一方

³⁶ 水牛是臺灣人印象中的溫馴動物，不但是農村主要的勞動力，也象徵著刻苦耐勞的精神。日治時期的臺灣作家作品中，水牛多半是點綴作品的鄉村風景之一，如楊達的〈水牛〉。不過在美術創作方面，倒是有不少以水牛為主題。最為著名的，大概是屬雕塑家黃土水的〈水牛群像〉，這個作品生動刻劃出牧童與水牛之間的互動。放牧牛隻的工作會由兒童來擔任，顯然是取決於水牛的柔順個性。這兩者之間的結合，在中國繪畫中已有許多例子可循。而臺灣畫家林玉山的作品〈歸途〉，則描繪出一位農婦與水牛的和諧情調，膠彩的質感與中國水墨畫大異其趣，臺灣鄉土色彩在此表露無遺。這幅畫也釋出一個訊息；農民和水牛之間的情感，是生活夥伴的依賴關係。

³⁷ 真杉靜枝在隨筆〈水牛〉一作，提到水牛極具臺灣色彩的動物，多半性情溫和。但是她也曾經在原住民族部落旅行時，看到兩隻水牛互相對峙的情況，讓她印象深刻。〈水牛〉收入《南方紀行》，東京：昭和書房，1941年（昭和16）發行。本文參考之復刻本係由原ひろ子監修，《南方紀行》（女性のみた近代：24），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年12月發行，頁197—201。

面代表血統上的親情，一方面也延伸為土地的象徵。〈南方的語言〉讓讀者思索，所謂「母語」的意義，已從母體的語言轉化為國體的語言。臺灣母親的死亡，象徵日本母親的現身。行文至此，花子的形象轉折，也從妻子的身分昇華為母親的角色。一筆之差的結局，將改變他們的命運。似乎可以預見，花子將帶領李金史，穿越重重關卡，輾轉抵達東京，邁向文化光明的人生。然而語言已非問題，種族血源卻不能置換，他們肯定會再面臨更艱難的課題。或許，兩人又再度落魄回到臺灣……至少殖民地是最後退路。虛構的故事，有太多的可能。〈南方的語言〉關於語言、身分、種族的混雜交融，終於化成一則愛情的寓言。

〈南方之墓〉與〈南方的語言〉兩篇作品的主題，都關注南方與愛情的辯證關係，展現殊異的地理想像。〈南方之墓〉裡的女人有家難歸，舊城之舊，儼然是一個文明墮落的「廢城」。〈南方的語言〉則透過「他鄉」來的女人，以木村花子的命運流轉，見證殖民地成為新故鄉的政治寓言。木村花子是一個有冒險性格的女人，最終她以堅強母性撫慰了殖民地男性。然而，木村花子的故事，終究只能成為一則傳奇。真杉靜枝的小說，是頗為煽情的。她以木村花子的人生試煉，撐起這篇小說的發展。所有事理似乎都不和諧，唯有浪漫的越界戀情作為說服力。南方之於真杉靜枝，既親切又疏離，長於斯的土地，曾經留下太多歷史記憶，有辛酸也有甜蜜。真杉靜枝終其一生，不斷尋尋覓覓真愛，為情感找尋終極歸宿。更進一步藉由創作以明志，促成她寫作動力的，端在「愛情」。透過渴望愛情的女性形象，用自己的創傷澆自己的塊壘。這些書寫也不妨視為她醫治情殤，追求自我治療的過程。

故鄉的辯證關係，成為真杉靜枝創作的靈感。日人女性的「家」之所在，是作者念茲在茲的書寫企圖。從〈南方之墓〉到〈南方的語言〉的敘事轉折，已經進行自我對話。〈南方之墓〉寫殖民地空間的禁錮，男性家長制的陰影；〈南方的語言〉則以木村花子的流轉身世，見證殖民地成為新故鄉的政治寓言。真杉靜枝兩篇作品的主题，從死亡到新生，有一種歸零再重新出發的覺悟，也展現殊異的鄉土與南方想像。女子歸鄉的路何其曲折，這兩篇作品，賦予「故鄉」多重繁複的意義，既投射對男性家國體制的欲拒還迎姿態，也不乏地理空間的豐饒想像。故鄉之為故鄉，在此透露似近且遠、既親且疏的情感位置。

四、惡評之女

真杉靜枝的文學活動，幾乎都在日本內地，雖然戰爭期比她活躍而知名的女性作家不在少數³⁸，但是她的殖民地經驗是相當特殊的例子，也成為真杉靜枝重要的文學特色。1955年，真杉靜枝死於癌症，享年53歲。她在生前是擁有惡評的女流作家，過世後的負面聲名也沒有獲得翻轉。

2007年1月號的《文藝春秋》「作家寫真專輯系列」³⁹，以真杉靜枝為主題。那張照片攝於1950年（昭和25）作家團體前往信州小諸的演講旅行途中，前列從左排序的作家依次為濱本浩、真杉靜枝、丹羽文雄、久米正雄。照片下面有一段文字，簡單介紹真杉靜枝：

³⁸ 例如吉屋信子、林芙美子、佐多稻子、円地文子宇野千代等女性作家，都在1940年代相當活躍。

³⁹ 樋口進，〈文藝春秋写真館（9）由紀しげ子 真杉静枝 壺井栄〉，《文藝春秋》，2007年1月號，頁11-14。

拿手的技藝是洋裁，自炫於穿著自己設計、剪裁的洋裝，但是同行的作家們對於這個特點好像不太明白的樣子。她和武者小路實篤、中村地平、中山義秀等多數作家談過愛情，也以戀愛豐富的女性而馳名。

寫出這段話的編者，顯然已對真杉靜枝做出道德評價。短短幾句話，道盡真杉靜枝在男性作家中的侷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話尚且是 2007 年的寫真集所附錄。對日本文壇來說，她和武者小路實篤、中村地平、中山義秀等男性作家的感情事件顯然比文學才華更爲可觀，關於她的生平描述，幾乎都是負面書寫。較爲正面的，應該是由她的親屬委託十津川光子所寫的《惡評之女：一位女性作家的悲歡生涯》⁴⁰。不過，林真理子以真杉靜枝爲主角所寫的《女文士》，倒是提出一些中肯的說法。林真理子分析真杉靜枝無法在文壇立足的原因，還是出於文學產量，更和本身的才華有關⁴¹。《女文士》當然也描寫真杉靜枝和眾多男性的關係，透過倒敘的方式，在第一章就以真杉靜枝的靈前守夜式啓開序幕，曾經和她發生戀愛關係的武者小路實篤和前夫中山義秀都有現身，中村地平則是始終沒有出現。真杉靜枝和中村地平的愛情，是由女方採取主動姿態，後來因爲男方家長的反對，以分手收場。中村地平的年少時期有南方憧憬，真杉靜枝則有南方恐懼。兩人的臺灣經驗，也成爲各自創作的重要靈感。1939 年分手之後，他們的人生不再交集，卻不約而同以文學響應戰爭。然而，真杉靜枝的私人生活，超越世人對她文學的矚目，對於真杉靜枝文學的研究，可說才在起步階段，是否能夠引起廣泛討論，還有待觀察。

⁴⁰ 十津川光子，《惡評の女：ある女流作家の愛と哀しみの生涯》（惡評之女：一位女性作家的悲歡生涯），東京都：虎見書房，1968 年。

⁴¹ 林真理子，《女文士》（女作家），東京都：新潮社，1998 年，頁 37—38。

真杉靜枝早期的創作，不斷寫著同一個故事，離開臺灣之後，殖民地成為她創作靈感的泉源。陰暗的、荒涼的舊城地標，構成一廢墟式的視景。「舊城」之名所指涉的文化地理意義及空間象徵，投射日人女性被囚禁的父權魅影。她以〈南方之墓〉的死亡意象來隱喻臺灣，殖民地文化退步的氛圍，扼殺女性的青春與愛情，具有令人窒息的恐怖意象。但是到了 1930 年代末期，她重新詮釋臺灣，〈南方的語言〉寫木村花子，兼及寫出她所愛的南方新故鄉，那是她丈夫的成長之地，也是改變她命運的所在。真杉靜枝藉文本銘刻生命的創傷，將內心的匱乏與慾望，重現字裡行間，顯示她與過去經驗角力的痕跡，並以此作為重新出發的宣言。真杉靜枝對於她成長的地方，開始出現自覺與自戀，南方作為創作的想像日益鮮明。

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白熱化，做為重要戰略地位的殖民地臺灣，真杉靜枝的臺灣想像也出現轉折，在許多以臺灣為主題的創中，展現了她協力戰爭的被動員姿態。根據李文茹的研究，真杉靜枝能夠以女性作家的身分參與戰爭的背後，事實上與她的殖民地成長背景有密切連繫。1939 年（昭和 14）從臺灣返回日本後，她在發表創作的同時，也積極強調自己與臺灣的關係。真杉靜枝的作品經常使用第一人稱，所以更能添加言論的可信性。對她的創作活動來說，1939 年再度前往殖民地的動機，除了探視親人之外，也可說是為了收集小說題材的旅行。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真杉靜枝在這次的旅行動機中，對於戰爭時期文壇有著強烈的意識。當然不可忽略的是，在真杉靜枝選擇以「後方女性」的身分，亟欲將自己殖民地體驗作為創作題材時，確實存在著以男性為主的文壇結構⁴²。

⁴² 請參閱李文茹，〈殖民地・戰爭・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第 12 期，2008 年 6 月，頁 63—80。

真杉靜枝的創作，呼應了她的成長背景與人生性格。如何在以男性爲主流的文壇中嶄露頭角？如何在戰時體制中佔據發言位置？惡女之惡，似乎成了必要之惡。她的創作擅長於強調臺灣經驗，臺灣作爲欲望的想像客體，彼岸的南方，是救贖的天堂，還是沉淪的地獄？透過她的作品，可以看出當時她對愛情的期待、時代的焦慮、甚至國家的想像。誠然，中村地平與真杉靜枝的南方書寫，有殊異的發展脈絡。1930年代前半，兩人的創作生涯都剛起步。中村對南方／臺灣的鄉愁，其實是懷抱著蠻荒時代的野性憧憬，以及濃烈的浪漫主義。真杉靜枝在經歷失敗婚姻後，耽溺於傷痕書寫，她的南方書寫全力聚焦在父權批判之上。1939年之後，兩人都出現文學轉折，卻也朝向各自的發展。中村地平開始關注日本殖民史上的臺灣原住民形象，真杉靜枝則重新詮釋南方的新故鄉想像。女性從主體的確立到家國的建構，一方面要掙脫男性的重圍，一方面卻要與男性共體時艱。真杉靜枝的南方書寫爲她個人帶來救贖力量，也爲後人保留一些吉光片羽，其中的豐富想像仍猶待開發。真杉靜枝的作家生涯，堪稱緋聞不斷。這些緋聞的真假，撲朔迷離；涉及她的成長、戀愛與作家生涯，爲她帶來虛華的聲名，反而模糊了真杉靜枝追求女性自主而朝向作家的理想。不過，現在也應該是回歸到以文學爲主體來認識真杉靜枝的時刻。

參考文獻

一、中文

(一) 專書

葉石濤，《展望台灣文學》（臺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

阿部由理香，《日治時期台灣戶口制度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0年）。

(二) 單篇論文

林雪星，〈兩個祖國的漂泊者：從坂口零子的《鄭一家》及真杉靜枝的《南方紀行》《囑附》中的人物來看〉，《東吳外語學報》，第22期，（2006年3月），頁39—64。

吳佩珍，〈皇民化時期的語言政策與內台結婚問題：以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爲中心〉，《台灣文學學報》，第12期，（2008年6月），頁45—62。

李文茹，〈殖民地・戰爭・女性：探討戰時真杉靜枝台灣作品〉，《台灣文學學報》，第12期，（2008年6月），頁63—80。

邱雅芳，〈南方與蠻荒：以中村地平的《台灣小說集》爲中心〉，《台灣文學學報》，第8期，（2006年6月），頁147—176。

二、日文

(一) 專書

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ある女流作家の愛と哀しみの生涯》（惡評之女：一位女性作家的悲歡生涯）（東京都：虎見書房，1968年）。

石川達三，《花の浮草》（花之浮草）（東京：新潮社，1965年）。

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田畑書店，1996年）。

林真理子，《女文士》（東京都：新潮社，1998年）。

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別卷【內地作家】）（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7月初版）。

真杉靜枝《ことづけ》（囑附），1941年（昭和16）11月發行。本文引用之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解說，《ことづけ》，（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19；【台灣編】7）（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年9月

發行)。

真杉靜枝，《南方紀行》，東京：昭和書房，1941年（昭和16）發行。本文參考之復刻本係由原ひろ子監修，《南方紀行》（女性のみた近代：24）（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年12月發行），頁197—201。

真杉靜枝，《婦休三日間》，大阪：全國書房，1943年（昭和18）發行。本文引用之復刻本係由長谷川啓監修，《婦休三日間》（〈戰時下〉の女性文学：14）（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2年5月發行）。

（三）單篇論文

火野葦平，〈淋しさヨーロッパ女王〉（寂寞的歐洲女王），《新潮》，1955年1月号。

平林たい子，〈真杉靜枝さんと私〉，《文芸春秋》，第48号，（1955年10月），頁62—68。

高良留美子，〈真杉靜枝「南方の言葉」を読む〉，《植民地文化研究》，第5号，（2006年），頁165。

樋口進，〈文藝春秋写真館(9)由紀しげ子 真杉靜枝 壺井栄〉，《文藝春秋》，（2007年1月號），頁11—14。

